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tudies of China's Frontier  
Regions and Nationaliti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 达力扎布 主编

#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

*Studies of China's Frontier Regions and Nationalities*

(第六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

The Research Center of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tudies of China's Frontier  
Regions and Nationaliti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

Studies of China's Frontier Regions and Nationalities

第六辑

达力扎布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 第6辑/达力扎布主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660-0318-8

I. ①中… II. ①达… III. ①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民族历史—中国—文集 IV. ①K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1771 号

##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 (第六辑)

---

主 编 达力扎布

责任编辑 张 山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电 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4

字 数 5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0318-8

定 价 5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编委会

主 编：达力扎布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东平      乌云毕力格      齐木德道尔吉

华 涛      刘正寅      张 云

达力扎布      陈 理      沈卫荣

苍 铭      宝音德力根      尚衍斌

赵令志      喜饶尼玛

编 务：王桂东

## 目 录

## 学术论文

- 吕光出兵西域原因及相关史事新考 ..... 陈 楠 (1)
- 从《华阳国志》看两晋巴蜀士人的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 ..... 彭丰文 (8)
- 唐代幽州地域的佛寺及其分布 ..... 尤 李 (17)
- 元代高昌鲁氏家族研究 ..... 尚衍斌 (33)
- 清康熙朝赈济朝鲜事探微 ..... 王桂东 (66)
- 策妄阿拉布坦与康熙末期清朝的准噶尔政策 ..... 刘 锦 (74)
- 清代历任三座塔理事司员略考 ..... 达力扎布 (86)
- 论乾隆初年准噶尔汗国延聘喇嘛之谈判及其影响 ..... 赵令志 (93)
- 清代亚东关署理税务司巴尔在藏事迹研究 ..... 梁俊艳 (110)
- 清末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创办时间与创办者诸家观点辩证 ..... 张景波 (132)
- “齐满人之心志，逐共和之权益”  
——民国前期满族同进会及其权利诉求 ..... 王 宇 (138)
- 西康藏族自治区的创建及价值研究 ..... 秦和平 (151)

## 文献研究

- 《析津志辑佚》诸问题探析 ..... 刘 晖 (169)
- 《安宁史》和《伊米德史》比勘 ..... 吾斯曼江·亚库甫 (179)

## 考察调研

- 黑龙江、阿穆尔河下游之旅 ..... [日] 细谷良夫著 王学勤译 (198)

## 学术研究综述

- 傅礼初在西方内亚史研究中的位置及影响 ..... 钟 焯 (211)
- 古代汉藏文化交流研究成果 (1979—2011) 述评 ..... 文厚泓 喜饶尼玛 (251)
- 青海蒙古族研究综述 ..... 韩官却加 (271)
- 鄂尔泰研究综述 ..... 张 姗 (290)
- 北京市法学会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会 2011 年年会综述 ..... 苏 钦 王 略 (301)

**学术论著译文**

- 额尔古纳·巴尔虎·布特哈 ..... 亦邻真著 陈晓伟译 (307)
- 广西发现土官印考 ..... [日] 谷口房男著 李德龙、李云霄译 (311)
- 新发现的喀尔喀珍贵法律文献（研究部分）  
..... [蒙古] X. 普尔来著 达力扎布译 (325)
- 喀喇沁土默特移民与近现代蒙古社会  
——以蒙郭勒津海勒图惕氏为例  
..... [日] 李儿只斤·布仁赛音著 白玉双译 (352)
- 英文摘要** ..... (367)

# 吕光出兵西域原因及相关史事新考

陈 楠

内容提要：公元4世纪80年代吕光用兵西域是东晋十六国时期重大历史事件之一。本文以藏文文献《红史》记载为依据，结合汉文文献记载，对吕光用兵西域原因再行探讨。主要考证内容：1. 关于西域车师前部国师其人其事；2. 关于鸠摩罗什身世及生平的最新考证。

公元4世纪后期，正值北方十六国时期。氏族豪酋苻坚（338—385，357—385年在位）于357年建立前秦政权，以王猛辅政，势力浸强，先后攻灭前燕、前凉、代国，统一了北方大部地区。苻坚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帝王，他不仅梦想消灭东晋，一统中原，也想效法汉代帝王，有经略西域诸国的宏图大志。

## 一、汉文史料中关于吕光出兵西域的记载

建元十四年（378）九月，“秦凉州刺史梁熙遣使人西域，扬秦威德。冬，十月，大宛献汗血马”，苻坚效法汉文帝拒绝汗血马的故事，“命群臣作止马之诗而反之”。<sup>①</sup>苻坚对大宛的汗血马没有兴趣，但他对西域的一个特殊人物有兴趣，这个人就是鸠摩罗什。史传记载：“什道震西域，声被东国。苻坚建元十三年，岁次丁丑，正月，太史奏有星见外国分野，当有大德智人入辅中国。坚素闻什名，乃悟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将非此耶？’”<sup>②</sup>将上述两条资料参而读之，不难发现，苻坚于建元十四年派遣使者入西域，不仅是“扬秦威德”这样的务虚使命，还应负有寻找“大智大德”之人鸠摩罗什的具体任务。

及至建元十八年（382），车师前部王弥寔（又作弥第）、鄯善王休密驮来朝，终于促成苻坚下令吕光率部出征西域。关于这次用兵，史籍文献记载颇多：

九月，车师前部王弥寔、鄯善王休密驮，入朝于秦，请为向导，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汉法置都护以统理之。秦王坚以骠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与凌江将军姜飞、轻车将军彭晃、将军杜进、康盛等总兵十万，铁骑五千，以伐西域。<sup>③</sup>

<sup>①</sup>《资治通鉴》卷104，晋孝武帝太元三年九月、十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287页。按汉文帝拒绝汗血马之事，参见《资治通鉴》卷13，汉文帝前元年，第443页。

<sup>②</sup>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4《鸠摩罗什传》，第532页。

<sup>③</sup>《资治通鉴》卷104，晋孝武帝太元七年九月，第3300页。

车师前部王弥赛、鄯善王休密驮朝于坚，坚赐以朝服，引见西堂。赛等观其宫宇壮丽，仪卫严肃，甚惧，因请年年贡献。坚以西域路远，不许，令三年一贡，九年一朝，以为永利。赛等请曰：“大宛诸国虽通贡献，然诚节未纯，请乞依汉置都护故事。若王师出关，请为向导。”坚于是以骁骑吕光为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与凌江将军姜飞、轻骑将军彭晃等配兵七万，以讨定西域。<sup>①</sup>

坚既平山东，士马强盛，遂有图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率将军姜飞、彭晃、杜进、康盛等总兵七万，铁骑五千，以讨西域。<sup>②</sup>

秦吕光行越流沙三百余里，焉耆等诸国皆降。惟龟兹王帛纯拒之，婴城固守，光进军攻之。<sup>③</sup>

建元十九年（383），吕光西出玉门关，用兵西域，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光抚宁西域，威恩甚著，桀胡王昔所未宾者，不远万里皆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光皆表而易之”。<sup>④</sup>苻坚惨败淝水之役后，负伤回朝，闻知吕光平定西域，“以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本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但至此时，前秦已是强弩之末，河西诸部纷纷脱秦自立，“道绝不通”，苻坚诏旨已无法到达西域了。吕光奉命出征却无法凯旋还朝，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光既平龟兹，有留焉之志”。此时，正是鸠摩罗什帮他出谋划策，“时始获鸠摩罗什，罗什劝之东还……”<sup>⑤</sup>

## 二、藏文史籍中的相关记载辨析

藏文史籍关于吕光出兵西域及相关史事的记载，主要见于历史名著《红史》（*Deb ther dmar po*）。<sup>⑥</sup>这部史籍成书于元至正年间，全书共分四个部分，前三部分记述印度古代王统及释迦世系、汉地历代皇帝事迹以及蒙古王统世系，第四部分是全书的重点所在，主要内容是吐蕃王统及西藏后弘期各教派的源流及相关历史。作者在记述汉地历史之时，不仅参考了大量藏文历史文献，还参考了汉文史学著作，同时也收录了汉文史籍以外的新材料，诸如为许多学者所熟悉的南宋末代皇帝的最终结局等内容。当然，其中所涉及的材料，有许多是援引当时的藏译文本，几经辗转，某些朝代名称、人名、地名等极易搞错，如不核实藏文原文，不了解汉地历史背景，仅作简单的文字解读，往往说不清楚，或者以讹传讹。相比而言，其中关于鸠摩罗什的记载，是藏文史料中涉关汉地历史人物比较详尽的篇章。许多细节记录，可补汉文史传之缺失。

### （一）关于车师前部国国师的考证

据《红史》记载：

①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11页。

②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4页。

③ 《资治通鉴》卷105，晋孝武帝太元八年，第3316—3317页。

④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5页。

⑤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6页。

⑥ 蔡巴·贡噶多吉（Tshal pa Kun dgav rdo rje）所著《红史》，成书于1363年。1981年，民族出版社根据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和西藏自治区档案局收藏的手抄本，整理出版了藏文铅印本，并附有著名藏族学者东噶·洛桑赤列（Dung dkar Blo bzang vphrin las，1927—1997年）先生在对七种不同版本精细比勘基础上所作的683条校注。陈庆英、周润年的汉译本《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本文的汉译文，基本参照汉译本，个别之处有所修正。



前秦 (Gavi tsiing) 时期, 有一印度的老班智达 (Pandi ta) 对国王说: “在印度和姜地 (lJang yul) 的一个小国里, 有往昔释迦牟尼佛上升三十三天时所造佛祖十二岁时等身像即觉卧释迦像 (Jo bo Shvakyā)、佛骨舍利 (Ring srel) 以及名叫鸠摩罗室利 (Ku ma ra shri) 的班智达, 因其国狭小, 此珍宝在彼处对众生利益不广, 请陛下发兵取来, 将对众生大有利益。”<sup>①</sup>

按藏文“班智达”源自梵文, 意为“大学者”、“善知识”, 一般是对有学识的出家僧人或修道者的尊称。这里提到的“来自印度的老班智达”, 在几篇汉文《鸠摩罗什传》中未见提及。笔者仔细搜寻相关史料, 终于发现了一些线索。释道安所作《摩诃钵罗若波罗密经抄序》记载: “会建安十八年, 正车师前部王名弥第 (或称弥寔) 来朝, 其国师字鸠摩罗跋提献胡《小品》一部, 四百二牒, 言二十千首卢。首卢三十二字, 胡人数经法也。即审数之, 凡十七千二百六十首卢, 残二十七字, 都并五十五万二千四百七十五字。”<sup>②</sup>另外, 在一篇未详作者的《阿毗昙心序》中, 亦有提及此人: “释和尚 (即释道安) 昔在关中, 令鸠摩罗跋提出此经 (即《阿毗昙经》)。其人不闲晋语, 以本偈本难译, 遂隐而不传。”<sup>③</sup>

这位随车师前部王弥寔 (弥第) 一同入朝前秦苻坚的车师国 (前部)<sup>④</sup> 国师, 名叫“鸠摩罗跋提”, 一定就是藏文史料中所说的“来自印度的老班智达”。《高僧传》及《出三藏记集》中, 未见有他的传记。《晋书》和《资治通鉴》等史籍, 只是记载车师前部王入朝事, 并不提及随行的国师。幸而在译经序文中, 存有少量的记载, 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带来了一部胡本《小品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参照藏文史料记载, 得知苻坚派遣吕光出征西域, 正是源出于车师前部国师的建议, 出征的目的是索取三样: 觉卧释迦佛像、佛骨舍利和班智达鸠摩罗室利 (鸠摩罗什)。按这里所说的“觉卧释迦佛像”, “觉卧” (Jo bo) 系藏文音译, 意为“尊者”。据藏文史籍记载, 此像系释迦牟尼 12 岁等身量鍍金铜像, 为古印度工巧天毗首羯摩 (Bi shwa karma) 所造。<sup>⑤</sup>此佛像系文成公主于公元 641 年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和亲时携入拉萨, 始建小昭寺供奉, 后移至大昭寺供奉, 直至今日犹存。关于此像之由来始末, 笔者已另撰专文探讨,<sup>⑥</sup>兹不赘言。

关于派遣吕光出兵西域事, 藏文文献云: “此王驾前有大臣国相 (blon po zhing gi chings sang) 及一统兵将军 (chu mi dben gyi dpon), 于是国王派将军领兵四十万众前

① 《红史》, 藏文本第 13 页, 汉译本第 12 页。

② 僧祐: 《出三藏记集》卷 8 《摩诃钵罗若波罗密经抄序》, 第 289 页。

③ 僧祐: 《出三藏记集》卷 10 《阿毗昙心序》, 第 377 页。

④ 车师: 古西域国名。原名姑师, 汉分其地为车师前后两部, 后皆属西域都护。车师前部治交河城, 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古城遗址。汉时曾设戊己校尉, 屯田车师前庭。南北朝时, 车师前部属北魏, 因遭北凉攻击, 公元 450 年西迁焉耆东部地区。

⑤ 参见萨迦·索南坚赞 (Sa skya bSod nams rgyal mtshan): 《西藏王统记》(rGyal rabs gsal bavi me long), 藏文本,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1 年, 第 14 页; 刘立千汉译本,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 8 页。

⑥ 参见陈楠: 《拉萨大昭寺觉卧佛像考》, 《中国藏学》2021 年第 2 期。

往。”<sup>①</sup>这里提到的“大臣国相”没有名字,有学者以为应指姚萇(330—393年)。<sup>②</sup>按姚萇曾“历左卫将军,陇东、汲郡、河东、武都、武威、巴西、扶风太守,宁、幽、兖三州刺史,复为扬武将军,步兵校尉,封益都侯”,<sup>③</sup>虽“累有大功”,但也还只是一名武将,既无丞相之名,亦无丞相之实。藏文史料接下又提到,正是这位丞相后裔杀前秦王自立。如此说来,此处“大臣国相”确实是指姚萇。

然而据史实判断,当时的辅政大臣应是苻融。苻融(?—383)是苻坚之弟,自王猛去世后,苻坚在国事方面对苻融多有倚重。据史书记载,至建元十六年(380年),“秦王召阳平公融为侍中、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sup>④</sup>在当时秦国,官高位显,无出其右。而且在许多重大举措之际,苻融都曾发表过自己的意见,诸如反对用兵西域及其后的进攻晋国(淝水之战)。建元十八年,当苻坚听从车师前部王及鄯善王建议,决定派遣吕光西征时,苻融谏曰:“西域荒远,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汉武帝征之,得不补失。今劳师万里之外,以踵汉氏之过举,臣窃惜之。”<sup>⑤</sup>当然,心高气傲的苻坚,不可能采纳苻融的劝谏。苻融无丞相名称,但行丞相之实,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至于这段藏文史料所称吕光40万大军,显然有夸大其辞之嫌。军队人数究竟多少,汉文史籍所记也不统一:《晋书》中言“总兵七万,铁骑五千”,《资治通鉴》则云“总兵十万,铁骑五千”。一般说来,古史中言讲军队人数时,“号称”人数常多于实际人数,估计七万人也是多说。

此外,《红史》还载有一段吕光自西域还军的史事:

(吕光)一行人在返回国王都城的途中,听说前秦国王已死,后嗣断绝,原来的丞相当了国王。于是将军召集自己的四十万军队,占据 Si chon 及二十四座州城(cevu mkhar),自己当了国王。<sup>⑥</sup>

这段藏文记载,与汉文史传有些出入,特别是 Si chon 一词颇令人费解。《红史》汉译本及东噶先生,都认为 Si chon 即“四川”。此外在《红史》之中,还载有一段译自汉文的唐蕃清水会盟(783年)盟文,也以藏文 Si chon 对译汉文“剑南西山”。<sup>⑦</sup>然而,认为吕光曾占据四川,显然与史实不符。史料记载,吕光自西域还军途中,得知淝水战后苻坚兵败被杀,遂拥兵自立,割据凉州,自称酒泉公,年号太安。<sup>⑧</sup>河西距离四川较远,《红史》所言 Si chon 不可能是指四川。查阅《新红史》的相应记载,则将 Si chon 写作 bSig chon,黄颢先生将其译作“四郡”,<sup>⑨</sup>然而对此未作任何解释。按藏文中

①《红史》,藏文本第13页,汉译本第12页。

②参见释迦·仁钦德(Shvakra Rin chen sde):《雅隆尊者教法史》(Yar lung jo bovi chos vbyung),汤池安汉译本,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19页。

③《晋书》卷116《姚萇载记》,第2965页。

④《资治通鉴》卷104,晋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第3295页。

⑤《资治通鉴》卷104,晋孝武帝太元七年九月,第3300-3301页。

⑥《红史》,藏文本第15页,汉译本第13页。

⑦《红史》,藏文本第22页,汉译本第19页。

⑧参见《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6页。

⑨参见班钦·索南查巴(Ban chen bSod names grags pa):《新红史》(Deb ther dmar po gсар ma),黄颢汉译本,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基字 ca 与 cha 常能互换通用，故而 Si chon 可以训作 Si con，Si con 的译音即为“四郡”，从语音角度分析完全能够成立。再联系历史事实，吕光所建后凉政权的辖境，的确奄有河西四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之地。因此，引文中所谓 Si chon，于情于理必是“四郡”无疑。

## （二）关于鸠摩罗什

据《红史》记载，吕光出兵西域要得到龟兹国的班智达，应该是鸠摩罗什的父亲鸠摩罗炎（藏文称鸠摩罗室利）：

大军到达该地时，该地国王问道：“上国与我等并无仇怨，大军为何来此？”将军回答说：“要取觉卧佛像、佛祖舍利、班智达三者，若不与即行交兵。”国王说道：“我处实有觉卧像和佛骨舍利，可以送上，但班智达已于去年去世，遗有一子，名叫鸠摩罗穷哇（Ku ma ra chung ba），年届十八，也可送上。”

将军统兵将这些带回。路上将军想道：佛祖舍利亦不知真假，带回此小儿（byis pa）恐无甚大用。因此一路上对（鸠摩罗穷哇）不甚礼敬。一日，彼等正骑马赶路，路边有一母马长嘶一声，将军战马也随之长嘶一声。此时班智达不禁失笑，将军问他因何发笑，班智达说：“此母马有一马驹因食草饮水滞留在后，母马担心它在众军队列中迷路，故向马驹呼唤：我在这里，快速赶来，记住不要迷路。”将军对班智达此语疑惑不信。片刻之后，果见路边有一马驹正在吃草，将军之乘马长嘶一声，那小马驹也长嘶一声，立即奔跑过来。于是将军传令让众军让开道路，让马驹跑到母马跟前。将军由此对班智达产生敬信。此后又有一日，军队准备在一座山的山腰上扎营夜宿，班智达阻止说：“我等不能在此夜宿，今夜将发洪水，在此扎营恐众军会被洪水冲走。”于是军队移至十多里外的山顶上驻扎。当夜果然洪水暴发，山的四周围被洪水淹没，变成一片汪洋。从此以后，将军对觉卧佛像、班智达和佛祖舍利三者产生虔敬信仰。<sup>①</sup>

关于吕光获得鸠摩罗什及返回东土的过程，《出三藏记集》、《高僧传》及《晋书》各传记载，几乎完全一致。现摘要如下：

十九年，既遣骁骑将军吕光将兵伐龟兹及焉耆诸国。临发，（坚）谓光曰：“闻彼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光军未至，什谓其王帛纯曰：“国运衰矣，当有勅敌。日下人从东方来，宜恭承之，勿抗其锋。”纯不从而战，光遂破龟兹，杀纯获什。光性踈慢，未测什智量。见其年尚少，乃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什拒而不受，辞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苦辞？”乃饮以淳酒，同闭密室，什被逼既至，遂亏其节。或令骑牛及乘恶马，欲使堕落，什常怀忍辱，曾无异色，光惭愧而止。光还中路，置军于山下，将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见狼狽，宜徙军陇上。”光不纳，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数丈，死者数千。光始敬异之。<sup>②</sup>

比较汉藏文记载，基本史事趋于一致：吕光西征龟兹，获得鸠摩罗什，见其年少，

<sup>①</sup> 《红史》，藏文本第14-15页，汉译本第12-13页。

<sup>②</sup>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4《鸠摩罗什传》，第532页。

不很礼敬；回军途中，通过预知洪水事，始对鸠摩罗什产生敬意。但在具体细节上，还有很大差异。藏文资料认为，随吕光东行的是“鸠摩罗穷哇”，按“穷哇”(chung ba)藏文意为“小”，小鸠摩罗是老班智达鸠摩罗室利之子，时年18岁。而在汉文史传中，完全没有提到这层意思。但比较各种文献记载，又有诸多前后矛盾及不合逻辑之处，令人费解。

据汉文史传记载，鸠摩罗什生于公元344年，前秦王苻坚早在建元十三年(377)就已是“素闻什名”，而为要得到这样一位大智大德之人，甚至不惜大举用兵，劳师袭远。而当吕光“杀纯获什”后，却又“见其年尚少”，“以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甚至于让他骑牛和恶马等等。吕光征龟兹，是在建元十九年，前后用两年时间，回军途中已是公元384年。如其生年属实，鸠摩罗什已是40岁了。显然生年与事实不符，否则一切都无法解释。而且，吕光强迫鸠摩罗什妻娶龟兹王女时说：“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苦辞？”这句话耐人寻味。这里使人似乎看到了一直藏在背后的一个影子，鸠摩罗什的父亲，龟兹国国师。吕光攻取龟兹国期间，一定对龟兹国师鸠摩罗室利(鸠摩罗炎)的事迹，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吕光将鸠摩罗什与其父亲比较，其父“聪明有懿节”，还不是娶了龟兹王的妹妹，无论学识还是地位，都远不如父亲的鸠摩罗什，为什么还要苦苦拒绝呢？这也是应了一句俗语，和尚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细致研究各类汉文文献记载，再比较藏文文献，笔者认为：早在建元十三年就已“道震西域，声被东国”者，当是鸠摩罗什之父，龟兹国师鸠摩罗室利(或鸠摩罗炎)，或称作老鸠摩罗什。因单从名字上来说，鸠摩罗室利与鸠摩罗什只有译音与用字的差异。建元十八年，车师前部国师鸠摩罗跋提对苻坚所提到的“班智达”，也是指老鸠摩罗什，在当时“西域诸国伏什神俊，咸共崇仰。每至讲说，诸王长跪高座之侧，令什践其膝以登焉”。另外，藏文史料中有老班智达已于去年去世之记载，再仔细分析汉文史传中的一段话：“光军未至，什谓其王帛纯曰：‘国运衰矣，当有勍敌。日下人从东方来，宜恭承之，勿抗其锋。’”笔者认为，这句话应出自龟兹国师老班智达之口，而且口气像是临终遗言，预见将有来自东方的“勍敌”进攻龟兹，抵抗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顺从为宜。

如果按照藏文史料记载，鸠摩罗什生年应在建元元年，即365年。当然，单凭这条史料就做结论，不免有些武断。关于鸠摩罗什生年的质疑，笔者现援引另外一条记载，以备参考：鸠摩罗什初学小乘，9岁随母往罽宾学佛，12岁时又随母返龟兹，途中进至沙勒国，在沙勒国时曾师从佛陀耶舍学《十诵律》。<sup>①</sup>据史传记载：佛陀耶舍罽宾人，出身婆罗门贵族，13岁出家学佛，27岁受具足戒，其后至沙勒国，得到沙勒国太子达摩弗多赏识及资助，“罗什后至，从其受学《阿毗昙》、《十诵律》，甚相尊敬。什随母东归，耶舍留止。顷之王薨，太子即位，王孙为太子。时苻坚遣吕光攻龟兹，龟兹王急，求救于沙勒，王自率兵救之，使耶舍留辅太子委以后任。救军未至而龟兹已败。王

<sup>①</sup>《十诵律》：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之根本戒律。佛家称背出律文而默修持谓诵，凡诵十回，依数分项记述，用以名经，故曰《十诵律》。原为后秦弗若多罗与鸠摩罗什共译，弗若多罗示寂后，又由龟兹僧昙摩流支续译，成58卷。东晋时，经罽宾僧卑摩罗叉整理补充，发展为61卷。

归，具说罗什为光所执，乃叹曰：‘我与罗什相遇虽久，未尽怀抱，其忽羈虏，相见何期？’”<sup>①</sup>

约于姚秦弘始三年（401）前后，佛陀耶舍亦东来姑臧来寻找鸠摩罗什，而此时鸠摩罗什已被姚兴迎至长安。鸠摩罗什听说其师佛陀耶舍已在姑臧，劝说姚兴将其迎至长安，先后诵译《昙无德律》、《长阿含》等经典，至弘始十五年（413）返回罽宾国，还曾“寻得《虚空藏经》一卷，寄贾客传与凉州诸僧，后不知所终”。<sup>②</sup> 根据这段记载，基本可以明确，鸠摩罗什年龄应比佛陀耶舍小15岁以上。如鸠摩罗什生于公元344年，示寂于弘始十五年（413），则其师佛陀耶舍东来长安已近80岁，弘始十五年再返回罽宾已近九旬。考其在长安诵译佛经等活动，以如此高龄亦难以置信。

姚秦时期，以鸠摩罗什为中心，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僧人集团。这一集团内，网罗了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界的许多俊杰人才。他们献身佛教事业，以译经、说法、传教为主要任务。鸠摩罗什及其弟子翻译佛经计35部294卷，其中主要有《小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以及《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成实论》等，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陈楠，女，1953年生，宗教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100081）

<sup>①</sup>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4《佛陀耶舍传》，第536页。

<sup>②</sup>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4《佛陀耶舍传》，第538页。

# 从《华阳国志》看两晋巴蜀士人的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

彭丰文

内容提要：《华阳国志》文本内容显示，以常璩为代表的两晋巴蜀士人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其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均以中原儒学理念为指导思想，这使得巴蜀士人成为结束地方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也使得成汉政权所面临的认同危机明显不同于两晋时期其他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秦汉以来中原文化在巴蜀地区的传播，是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基础。

十六国时期，众多少数民族政权先后涌现，但是这些政权大多遭遇到很大的认同危机，特别是十六国前期，认同危机尤为凸显。其中，导致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认同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对其政权建立者民族身份的质疑，主要表现为“夷夏之辨”即夷夏观念的斗争。而建立在西南地区的成汉政权，虽然同样是由少数民族所建，由夷夏观念引发的冲突却并不明显，其认同危机主要是源自“大一统”观念，主要表现为统一与分裂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成汉政权又是十六国时期众多割据政权中，最终“回归”两晋王朝疆域的唯一政权。探其缘由，两晋巴蜀士人的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取向乃是重要因素。通过对《华阳国志》文本的解读与分析，笔者对这一历史现象有了更深的认识。

《华阳国志》是一部西南地方史志，记述了自远古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华阳地区即古代巴蜀、南中地区的历史地理，据任乃强先生考证，作者常璩为巴蜀本土大族士人，曾在成汉政权中担任史官、散骑常侍等重要官职，亲历成汉政权兴衰，在两晋巴蜀士人中颇有名望，是两晋巴蜀士人的代表性人物。<sup>①</sup> 作为一部由巴蜀士人代表性人物亲自编撰的史书，《华阳国志》为我们了解两晋巴蜀士人的思想观念提供了一份切实可靠的文本资料。透过《华阳国志》的文本叙述，特别是其中对成汉政权及其建立者李氏的称呼与态度，我们对常璩及其身后所代表的两晋巴蜀士人的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 一、从《华阳国志》看两晋巴蜀士人的民族观念

《华阳国志》主要记载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保存了大量西南地区民族资料。据统计，《华阳国志》所记载的少数民族或部族名称，涉及整个西南绝大部分地区，数量多

<sup>①</sup> 参见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另注：本文所引用《华阳国志》正文文字均采用该版本。

达三十多个，与前代及同时代文献相比，在记载少数民族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较大的拓展。<sup>①</sup>透过《华阳国志》对西南地区各民族的文字描述，特别是透过《华阳国志》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称呼与分类，可以了解到作者常璩的民族观念，进而对两晋时期巴蜀士人的民族观念略窥一斑。

《华阳国志》对少数民族的称呼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对少数民族进行了粗略归类，分别归入夷、羌、氐、叟等几个族类体系，并与地名或其他词汇连缀，以指称具体、特定的族群种类，例如《华阳国志》卷一《巴志》载有“广汉、汉中羌”等族称，卷三《蜀志》载有“笮夷”、“摩沙夷”等族称，卷八《大同志》载有“关中氐”、“巴氏”等族称。第二类是冠以准确的、特定的民族称呼，如卷一《巴志》有“濮、賨、苴”、“蛮”等族称。以上两种民族分类方法和族类称呼，显示了作者常璩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较之前人更为细致和深入。另外，《华阳国志》中对少数民族的称呼与分类还有第三种类型，即笼统将各种涉笔的少数民族均称为“夷”、“蛮”、“蛮夷”、“夷獠”、“夷濮”、“胡夷”、“戎虏”等等，以示所陈述对象是与汉族（华夏）相对应、相区别的族类，而不细究所陈述对象到底是哪一个具体族类。例如《华阳国志》卷一《巴志》载，秦襄王与賨人刻石为盟曰：“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雇死俵钱。”卷三《蜀志》曰：“讨叛鄙，降夷人，安种落，蛮夷率服。”卷四《南中志》曰：“部永昌从事江阳孙辨上南中形势：‘七郡斗绝，晋弱夷强。’”上述语例中的“夷”、“夷人”、“蛮夷”等词汇，均是用以表明被陈述对象的“非华夏”的民族身份，而并不刻意深究具体属于哪一族类。这种简单、宽泛的民族分类方法和对少数民族的笼统称呼，体现了两晋巴蜀士人作为华夏民族成员的固有历史叙述视角，显示了强烈的华夏中心主义心态，反映了中原儒家学说的民族观即“夷夏之辨”对两晋巴蜀士人的深厚影响。

“夷夏之辨”是先秦两汉以来儒家学说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春秋战国时期，在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与冲突中，华夏族逐渐产生了具有鲜明的民族优越心理的夷夏观，并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充实与强化，形成了一套论述华夏族与周边其他民族关系的民族理论，又称为“夷夏之辨”。这套理论将周边民族按照地理方位泛称为蛮、夷、戎、狄，或简称为“四夷”，华夏族则称为夏、华夏或“中国”，华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可概括为夷夏关系，夷夏之间具有夷夏对立、夷夏一体、夷卑夏尊、夷夏可变的辩证统一关系，夷与夏共同组成“天下”，即人类社会。由此可见，儒家学说在理论与逻辑的层面上，并不关心“夷”的具体种类，而只是笼统将其视为与华夏民族形成对立统一关系的一方。“夷夏之辨”是先秦两汉以来中原地区的主流民族观，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代中原王朝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的指导思想。随着中原文化以及中原王朝的政治统治向四周扩散，儒家学说的民族观逐渐扩散、影响到边疆地区。《华阳国志》对于“夷”、“蛮夷”等名词概念的运用，体现了常璩对先秦两汉以来中原儒家民族观的接受与运用，反映了中原文化在巴蜀地区的传播。正因为如此，《华阳国志》中，多处使用“民夷”或者“夷民”的称呼，用来概括特定区域内

<sup>①</sup> 吴国升：《略说〈华阳国志〉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记载》，《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9期。

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内的全部人口,其中“民”所指称的是华夏民族,“夷”则与“蛮夷”、“夷獠”、“胡夷”、“戎虏”等词语意思相同,表达“非华夏”的含义。例如《华阳国志》卷二谈及张鲁道教时曰:“巴、汉夷民多便之。其供道限出五斗米,故世谓之‘米道’”。卷四《南中志》论及南中统治状况时,也反复用到这两个词语。如“梓潼景毅为益州太守,承丧乱後,民夷困饿,米一斗千钱,皆离散。”“逊恶衣菜食,招集夷民。”“万寿县郡治。有万寿山。汉本有盐井,汉末时夷民共诅盟不开,今三郡皆无盐。”

这里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华阳国志》对成汉政权建立者李氏的族类称呼以及由此体现的常璩对成汉李氏的族属认定。如上所述,《华阳国志》以“夷”、“蛮夷”、“胡夷”等称呼表达“非华夏族”的含义,与这些族类称呼相对应的则往往是“汉”、“晋”、“民”、“华”等名词概念,表达“华夏”族类概念。特别是“民”,在《华阳国志》中大多用来指代华夏民族。然而颇为令人意外的是,《华阳国志》中提到成汉政权建立者李氏时,也冠以“民”的称呼。例如《华阳国志》卷八《大同志》曰:“(元康)八年……略阳、天水六郡民李特及弟庠、阎式、赵肃、何巨、李远等,及氏叟、青叟数万家,以群土连年军荒,就谷入汉川,诏书不听入蜀。”这里常璩不仅将李氏纳入“六郡民”群体范围,而且将其与“氏叟、青叟”等蛮夷名称并列,其将李氏与“蛮夷”区分开来的用意十分明显。这种观念在他另外一处叙述中也表露无遗。《华阳国志》卷一《巴志》曰:“李雄,宕渠之厮伍、略阳之黔首耳,起自流隶,君获士民,其长人之魄,良有以也?”这里论及李氏,常璩称之为“厮伍”、“黔首”、“流隶”,这些称呼,一般都是用来指称中央政权直接统治下的华夏之民,很少用于指代蛮夷。在上引论及李雄身份的引文中,对李雄的身份界定多达三种,但都只是强调李雄身份地位卑贱,而并无贬斥其为“蛮夷”的痕迹。显然,常璩已将李氏视为华夏民族成员,至少也是视之与华夏之民无异。

那么,常璩是不是对李氏的族源问题不太清楚呢?非也。其实常璩对李氏的族源以及迁徙历程是非常清楚的。《华阳国志》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曰:“李特,字玄休,略阳临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賸民。种党劲勇,俗好鬼巫。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賸人敬信。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汉中。魏武定汉中,曾祖父虎与杜濩、朴胡、袁约、杨车、李黑等移于略阳北土,复号曰‘巴氏’。”这里常璩明确指出李氏源自賸民。而在常璩的民族分类中,賸民毫无疑问属于“夷人”。对此常璩也有清楚的表述。《华阳国志》卷一《巴志》将賸民先祖即胸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射虎英雄称作“夷”、“夷人”,指出賸民源自“白虎复夷”,又曰“板楯蛮。”可见常璩明确无误地将賸人归入蛮夷之列,有别于华夏。可是,常璩并没有因为李氏源自賸人而将其归入蛮夷之列,而是称之为“民”,视为华夏族类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常璩称李氏的先祖为蛮夷,而将李特、李雄之辈视同华夏?笔者认为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与賸人自身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与李氏自身的汉化有关。李氏自东汉末年自宕渠迁至汉中,继而迁至略阳,在不断迁徙、与他族共处的过程中,其原有的部族特征逐渐淡化。特别是略阳本为汉、氏、羌等多民族杂居地,賸人迁至略阳后,不可避免地受当地各族的影响,特别是出现了明显的“氏化”、汉化趋势。由于受氏人影响较大,因此李氏賸人被冠以“巴氏”的族称。李氏的汉化也是非常突出的。吕一飞先



生指出，魏晋十六国时期“是板楯蛮汉化的一个高潮”，“板楯蛮——以李氏为代表的那一部分——……全盘吸收了汉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成了与汉族融合的高潮。”<sup>①</sup>《晋书》卷一二〇《李特载记》记载；李氏曾受汉晋王朝的官职，李氏先祖曾被曹操拜为将军，李特之父李慕被西晋政权授予“东羌猎将”的官职，李特“少仕州郡，见异当时”。李氏族人的这种经历十分有利于加快本族的汉化进程。李氏建立政权、成为统治阶层，则使李氏的汉化进程更为迅速，族人的汉化特征更加明显。例如《华阳国志》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载，李特长子李荡“好学，有容观”，李雄言谈之中常常引经据典，善于“雅谈”，李期“少攻学问，有容观。”这些记载显示出李氏受汉文化影响之深。正是因为李氏身上有较为明显的汉化特征，常璩没有简单地将他们归入“蛮夷”之列。另一方面，这与中原儒家民族观所秉持的“夷夏可变论”紧密相关。中原儒家民族观虽然认为夷夏之间差别很大，且华夏优于夷狄，但是族源和血缘并不是辨识民族身份的关键性因素，文化特征才是核心要素。换言之，只要接受了华夏文化、中原礼乐，蛮夷就可以被视作华夏民族，其族源与血缘是否源自华夏已不重要。这种认识，也是中原儒家夷夏观的精华所在。常璩正是秉持这种精神，在明知李氏先祖为“蛮夷”的情况下，仍然将其视同华夏成员。

常璩对李氏的认识，在两晋时期的西南地区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当时西南地区社会各层、特别是巴蜀士人较为普遍的认识。这可以从成汉时期巴蜀士人对待成汉政权的态度中得到反映。在两晋时期的北方地区，“夷夏”之争非常激烈，不少汉族士大夫以效力于胡人政权为耻，夷夏之别十分突出，这种现象在汉赵、石赵等十六国前期建立的胡人政权中尤为集中。其原因是北方诸多政权的建立者被认为是有别于汉族的“夷狄”、“胡夷”。然而，由于“夷夏之辨”引发认同危机的现象在成汉政权中却没有出现。在现有的有关成汉政权的史料中，没有看到巴蜀士人对李氏族类身份的关注和质疑，更没有看到由此而引发的夷夏争论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成汉政权合法性的质疑。吕一飞先生认为，成汉政权是“十六国时期汉化程度最高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这个政权中，找不到什么民族压迫的痕迹，这是难能可贵的。”<sup>②</sup>换言之，成汉政权内部的民族关系较为融洽，民族矛盾相对缓和，特别是与同时期的北方胡人所建政权相比较的话更是如此。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大部分巴蜀士人心目中，李氏的民族身份不是问题，李氏已经被他们视同为华夏民族的成员。由于李氏没有被视作蛮夷，因此成汉政权没有像北方胡人政权那样受到当地汉族士人的激烈抵触，夷夏之别也就没有像在北方地区那样一时成为舆论敏感话题。

## 二、从《华阳国志》看两晋巴蜀士人的国家认同

与北方诸多胡人政权建立之初遭遇到汉族士人普遍的强烈抵触相比，作为十六国时期最早创建的少数民族政权，成汉政权的幸运确实显得比较特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成

<sup>①</sup> 吕一飞：《板楯蛮略论》，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撰：《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页。

<sup>②</sup> 吕一飞：《板楯蛮略论》，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撰：《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45页。